

汉语同义词研究范式的历史演进

张 灿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 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6日

摘 要

汉语同义词研究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 形成了从传统训诂学 to 现代语言学的范式演进轨迹。本文以研究方法的转变为线索, 将汉语同义词研究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传统训诂学范式以段玉裁“浑言析言”术语为代表, 形成了基于经典解读和经验归纳的辨析方法; 现代语言学范式确立期引入西方语义学理论, 开始关注词汇的系统性; 多元化与精细化范式则以义素分析法的引入为标志, 实现了同义词辨析的科学化、形式化转型。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系统梳理, 本文揭示了汉语同义词研究从经学附庸到独立学科、从经验归纳到科学分析、从零散考释到系统建构的演进历程, 并对各阶段的核心方法、代表性成果及理论局限进行了评述, 以为当代词汇学研究提供学术史的参照。

关键词

同义词研究, “浑言析言”, 义素分析, 研究范式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on Chinese Synonyms

Can Z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June 24, 2026; published: July 6, 2026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Chinese synonyms has formed a paradigm evolution track from traditional exegesis to modern linguistics. Based on the change of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onym research into three stages: the traditional exegetical paradigm is represented by Duan Yucai's terms of "Hunyan Xiyen", which forms a discrimination method based on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mpirical induction;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linguistic paradigm, western semantic theory was introduced and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systematicness of vocabulary.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refinement paradigm is mark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sememe analysis, which realizes the scientific and formal transformation of synonym discrimination. By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se three stag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ynonym research from the dependenc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o independent disciplines, from empirical induction to scientific analysis, from scattered textual research to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comments on the core methods,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and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each stage in order to provide academic history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lexicology research.

Keywords

Synonym Research, “Hunyan Xiyan”, Sememe Analysis, Research Paradig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同义词的丰富是语言富有表达力的重要标志，而同义词研究也一直是汉语词汇学的核心课题。从先秦《尔雅》的“同训”汇编，到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浑言”“析言”的系统运用，再到当代基于义素分析法的精细化辨析，汉语同义词研究走过了一条从经验描述到科学分析的漫长道路。对这一学术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汉语词汇学的发展脉络，也能为当前的同义词研究和辞书编纂提供历史借鉴。

本文以“研究范式”为核心视角，借鉴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理论，将汉语同义词研究的演进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传统训诂学范式、现代语言学范式确立期、多元化与精细化范式。在宏观分期的基础上，本文特别聚焦于“浑言析言”与“义素分析”这两个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核心概念，通过考察其内涵、方法及理论贡献，揭示汉语同义词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范式”在此处指某一学术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内共同遵循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范式的转换并非简单的“进步”或“取代”，而是研究视角、问题意识和学术目标的根本性转变。

2. 传统训诂学范式

2.1. 传统同义词研究的学术渊源

汉语同义词研究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产生了第一部语义学著作《尔雅》，晋人郭璞称其为“六艺之钤键”（郭注《尔雅·序》）。洪成玉(2017)指出《尔雅》的核心工作正是“罗列古人所用的同义词，而用当代的词语来解释它们”[1]，其“同训”体例——将多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归并在一起，用一个通用词进行解释——奠定了后世同义词研究的基本模式。

李晓春(1999)的研究表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则从字形分析入手，通过“互训”“递训”等方式揭示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联。如“讽，诵也”“诵，讽也”，这种互训方式实际上是在构建同义词网络[2]。然而，无论是《尔雅》的“同训”还是《说文》的“互训”，都主要服务于解经释义的实际需要，尚未形成自觉的、系统化的同义词研究理论。

真正使同义词研究走向自觉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他们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

提出了一系列训诂术语和分析方法,王頊(2008)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创立的“浑言”“析言”理论[3]。

2.2. “浑言”“析言”的理论内涵与方法论意义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系统运用“浑言”(又称“统言”“散言”)与“析言”(又称“对言”)这对术语,主要用于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同异”与“通别”。所谓“浑言”,是指从笼统、宽泛的角度来看,几个词可以通用,强调其共同性;所谓“析言”,则是从精细、严格的角度来分析,几个词各有侧重,强调其区别性。

周光庆(1987)的研究以段注对“牙”与“齿”的辨析为例:“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这种分析既承认了二词在浑言状态下的通用关系,又揭示了析言状态下的部位差异[4]。再如“宫”与“室”:《尔雅·释宫》云“宫谓之室,室谓之宫”,郭璞注“明同实而两名”,这是浑言其同;而段注则进一步指出,析言之,“宫”言其外围垣墙,“室”言其内室,各有侧重。

马景仑(1997)研究表明,段玉裁运用“浑言”“析言”辨析同义词,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方法。这包括:征引比较《说文》说解、征引古代训诂、比较归纳文献语言中的用例、察看各自的语源、察看各自的引申义、察看各自的今俗语[5]。这些方法虽然尚未完全脱离随文释义的传统,但已经显示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梅书静(2012)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说文解字注》中“浑言”“析言”术语所系之词,只有一小部分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而大部分是近义词和类义词[6]。这一发现提示我们,段玉裁对“同义”的理解是较为宽泛的,他关注的是词与词之间各种类型的意义关联,而非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严格同义关系。

2.3. 传统范式的整体特征与理论局限

以段玉裁为代表的传统训诂学范式,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整体特征也鲜明地反映出这一范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方法论局限。

首先,传统同义词研究具有明显的经学附属性,其主要目的在于解读儒家经典,问题意识多源于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障碍,而非对词汇系统本身的理论兴趣。正如洪成玉(2017)所指出的,我国传统语言学“肇始于词义研究”,而训诂学正是“为准确理解这些经典著作应运而生的”[1]。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较强的经验归纳性。无论是“浑言”“析言”的运用,还是对古书义训、文献用例的征引,都主要依赖学者的个人学养与语感积累,缺乏形式化、可重复的操作程序。这种方法长于洞察细微的语义差异,却短于构建系统的理论框架。再次,研究单位具有零散性的特点。传统研究多以单篇考释或随文注疏的形式呈现,缺乏对同义词系统的整体把握。有学者批评段注“在同义词组上,常常缺乏系统性”,这一缺陷实际上是传统范式共有的局限。最后,其术语体系带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浑言”“析言”等术语是从具体的训诂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实用性很强,但内涵往往不够精确,使用时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浑言则同,析言则异”,需要根据语言的实际运用情况加以分析,不可简单套用。

尽管存在着上述限制,传统训诂学范式依然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学术成果。钟明立(2001)评价段玉裁“构建了一套相对科学的、用于综合训释同义词差异与共性的训诂术语”,并对众多同义词进行了精妙的辨析,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材料依据和方法论开端[7]。

3. 现代语言学范式的确立

3.1. 西学东渐与学术转型

20世纪初期,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后,汉语研究迎来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同义词研究也逐步摆

脱了经学的束缚，转变为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自主课题。

这一转型的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 and 语义场理论的兴起。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思想，以及特里尔等人提出的语义场理论，促使学者开始关注词汇的内部系统性，而非仅仅停留在个别词的考释上。与此同时，王力、吕叔湘等第一代现代语言学家，在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同时，致力于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言学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现代语言学范式强调区分“字”与“词”，明确“同义词”作为词汇学概念的独立地位。传统训诂学常常不加区分地讨论字与词的关系，而现代学者则自觉地将“词”作为基本分析单位，这为同义词的精确界定提供了前提。

3.2. 同义词界定标准与分类研究

现代语言学范式确立期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同义词的界定标准问题。据池昌海(1998)对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的概述，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同义词确定标准的研究、同义词认定方法的研究、同义词的下位分类及研究范围、同义词的认定与词性同异问题[8]。

关于同义词的界定，学者们提出了多种标准。有学者(如周祖谟，1959)主张以“概念同一”为标准，即同义词必须是表示同一概念的不同词[9]；有学者(如吕叔湘，2006；张永言，1982)强调以“替换”为标准，即在特定语境中可以互换而不改变意义[10][11]；还有学者(周光庆，1989)提出以“义位相同或相近”为标准，从语义系统的角度进行界定[12]。这些讨论反映了学界对同义词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分类研究方面，学者们开始区分“同义词”与“近义词”、“等义词”与“近义词”等不同层次。洪成玉(2017)认为，从宏观角度分析，汉语同义词的产生与演变可归为共时和历时两类[1]：共时层面的同义词主要指在同一时间段内相对稳定的词义现象，例如先秦时期的“宫”与“室”；历时层面的同义词则指在词或词义的发展演变中新增的成员，如秦汉时期“殿”与“宫”构成同义词关系。这一划分超越了传统研究局限于共时层面的束缚，为同义词的历史考察提供了新的方向。

3.3. 辞书编纂的系统化实践

现代语言学范式的确立，不仅体现于理论探讨与方法更新，也反映在同义词词典编纂的系统化实践之中。1983年，由梅家驹等人编纂完成的《同义词词林》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类义词典。该书将汉语词汇划分为12个大类、94个中类、1428个小类，通过多层级的语义分类框架系统展现词与词之间的同义或近义关系。这一编纂体例明显受到西方语义场理论的影响，试图以词汇的聚合关系为轴心，构建汉语词汇的整体语义网络，标志着同义词研究从零散考释走向系统描写的重要转折。

此外，各类同义词词典相继问世，其中张志毅的《简明同义词典》在吸收现代语义学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对同义词进行细密的义理辨析，既保留了传统训诂的精细观察，又融入了结构主义语义学的分类意识，成为理论与应用结合的典范。这些辞书编纂实践具有双重学术功能：一方面，它们将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转化为可供语言教学、写作指导和日常查阅使用的工具书，实现了知识的普及化与社会化；另一方面，它们为同义词理论研究提供了规模可观的语言素材和检验场域，促使学者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同义词的界定标准、辨析方法及语义描写框架。辞书编纂与理论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现代语言学范式确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也为后续义素分析法的引入和精细化辨析奠定了实践基础。

3.4. 现代范式的突破与未竟课题

相较于传统训诂学范式，现代语言学范式在研究对象、理论视野和方法意识上实现了重要突破。同义词研究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经学附庸地位，不再仅仅服务于经典解读的实用需求，而是成为词汇学研究

中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学术课题。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从“某词在某句中作何解”这类随文释义的问题，转向“某词与某词在词汇系统中构成何种关系”这一本体论层面的追问。与此同时，语义场理论的引入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根本性转换——同义词不再被视作孤立的词对，而是被置于词汇系统的整体关联中加以考察。此外，现代学者开始对同义词研究的基本概念、方法和任务进行自觉反思，尝试建立具有理论自觉的分析框架。

然而，现代语言学范式在取得上述突破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未竟的课题，这些课题构成了范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如何将源于西方语言的语义学理论有效地应用于汉语的实际面貌，避免生搬硬套或削足适履？如何在追求科学化、系统化的同时，不丧失对汉语词义细腻性和语境依赖性的敏感？如何处理共时描写与历时演变之间的关系，使同义词的系统分析能够与词汇史的动态考察有机结合起来？这些问题在当时尚未得到充分解决，却为下一阶段义素分析法的引入以及多元化研究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4. 义素分析法的引入与发展

4.1. 义素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与方法程序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语同义词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最显著的方法论突破，是义素分析法的系统引入和广泛应用。

义素分析法源于欧洲结构主义语义学，其基本理念是将词义分解为若干最小的语义区别特征——义素(sememe)，通过对比不同词的义素构成来揭示其异同。这一方法借鉴了音位学中区别特征的分析思路，试图使语义分析达到与语音分析同样的形式化和科学化水平。

在汉语学界，张志毅是最早系统引入并发展义素分析法的学者之一。在其《词汇语义学》等著作中，他提出从“基义”(核心意义)、“陪义”(附属意义)、“义域”(意义范围)等多个维度对同义词进行精细分析。这种方法将同义词辨析从传统的定性描述推进到可操作、可验证的形式化分析阶段。

任晓静(2017)研究“看”类动词的义素分析，普通话中的“看”“望”“盯”“瞟”“瞪”等词，可以通过[+视觉][+方向][+方式][+程度]等义素特征进行区分。“看”为[+视觉]，是无标记的中性词；“望”为[+视觉][+远距离]；“盯”为[+视觉][+专注][+持续]；“瞟”为[+视觉][+短暂][+斜向]；“瞪”为[+视觉][+用力][+愤怒]。通过这样的义素分析，一组近义词的意义差别可以得到清晰的呈现[13]。

4.2. 义素分析在同义词辨析中的应用

义素分析法可以精确揭示同义词的异同。传统方法往往只能笼统地说“A与B相近，但有细微差别”，而义素分析可以具体指出差别所在。如有学者对汉语身体动词进行义素分析，深入词彙内部找出不同词语“共同性”及“区别性”的义素特征，以展现汉语身体动词概念分类之细腻。

义素分析法可以建立词义的系统关联。通过义素分析，可以发现不同词之间的层级关系。如“走”“跑”“跳”“踢”等词，既共享[+足部动作]的核心义素，又在[+速度][+方式][+目的]等陪义素上形成对立，构成一个完整的语义场。

义素分析法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科学依据。当代辞书在辨析同义词时，越来越多地采用义素分析的思路。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在释义中通过释出示差语素来区分同义词：“陈腐(陈旧腐朽)/陈旧(旧的；过时的)”，“焦急(着急)/焦躁(着急而烦躁)”，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对义素分析法的实践应用。

义素分析法可以服务于计算语言学等应用领域。苗杰(2014)指出，伴随信息时代的来临，大量近义词的存在为计算机的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以及人机对话造成了诸多难题与挑战。义素分析则能够为计算机提供形式化的语义表征，有助于化解这些问题[14]。

4.3. 从“浑言析言”到“义素分析”

尽管“浑言析言”与“义素分析”分别属于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从认识论层面看，二者都关注词义的“同”与“异”。“浑言则同，析言则异”揭示的正是词在笼统使用时呈现的一致性，与在精细区分时呈现的差异性——这恰恰是义素分析所要解决的“共同性义素”与“区别性义素”的问题。蒋绍愚(2015)指出，“有一个限定性义素不相同，可以是近义词，也可能是同义词”[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用现代术语对“浑言析言”传统进行了重新阐释。

从方法论层面看，二者构成互补关系。“浑言析言”长于从整体上把握词义关系的类型，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洞察力，但其分析往往依赖学者的语感和经验，缺乏可重复的操作程序。义素分析则追求形式化、精确化，可以通过义素特征的对比进行验证，但其分析有时流于琐碎，可能忽略词义的整体性和语境依赖性。

因此，当代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先用“浑言析言”把握同义词关系的基本类型，确定辨析的方向和重点；再用义素分析进行精细描写，使辨析结果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这种古今方法的对话与融合，正是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体现。

4.4. 当代研究的多元化趋势

除义素分析法外，当代汉语同义词研究还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其中认知语言学、历史词汇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的交叉融合尤为值得关注。

传统义素分析法往往预设词义具有清晰的边界和离散的特征，但认知语言学提出的原型范畴理论(prototype theory)对此提出了挑战。该理论认为，同义词并非由一组等值的区别性特征简单构成，而是围绕典型成员(prototype)构成一个范畴，成员之间呈现“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例如，汉语“看”“瞧”“望”“盯”“瞟”等词，虽然共享[+视觉]的核心义素，但在典型性上存在差异：“看”是最典型的成员，而“瞟”处于范畴边缘。近年来，李华平(2017)等学者进一步将认知隐喻和转喻机制引入同义词研究，探讨词义延伸如何导致同义关系的形成与分化[16]。这一视角弥补了义素分析可能带来的“边界清晰化”和“意义原子化”的局限，强调词义的动态性和心理现实性。

蒋绍愚(2015)、汪维辉(2021)等学者从历时演变的角度研究同义词的形成、发展和更替，关注“地有南北，时有古今”对同义词系统的影响[15][17]。这种研究将共时描写与历时解释结合起来，不仅描述了“同义词场”的静态结构，还动态展示了词义分工、语用迁移和词汇兴替的过程。近年来，基于大规模历时语料库(如 CCL 语料库、BCC 语料库)的量化分析，使得历史词汇学研究获得了更坚实的实证基础。

进入 21 世纪，大规模平衡语料库和计算工具的普及，推动同义词研究从内省式辨析走向基于真实语言使用的实证分析。研究者可以通过考察同义词在语料库中的词频分布、显著搭配(collocation)、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语体分布(genre distribution)等多维特征，获得客观、可重复的辨析结果。例如，通过对比“持续”与“继续”的典型搭配，可以发现前者常与“状态”“高温”等静态名词共现，后者则与“工作”“推进”等动态动词搭配，这种差异在传统内省分析中容易被忽略。近年来，基于词向量(word embedding)和预测性语言模型的“分布语义学”方法，更是能够自动计算词语之间的语义相似度，为大规模同义词集的自动识别和辨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当代汉语同义词研究已不再是单一方法的天下，而是形成了认知解释、历史考证与语料库量化相结合的多维格局。不同视角之间既有互补，也存在方法论上的张力：语料库方法追求客观性，但可能忽视词义的心理认知基础；认知方法注重解释力，但有时缺乏严格的实证检验。如何在不同范式之间建立有

效的对话与整合，是当前研究需要继续探索的方向。

4.5. 国际研究背景的互动与观照

20 世纪上半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在欧洲兴起，随后由特里尔(J. Trier)等人发展为语义场理论。这一理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由美国描写语言学和欧洲功能语言学的双重路径传入中国，深刻影响了王力、孙常叙、张永言等第一代现代汉语词汇学家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语义场理论在汉语应用中并非全盘照搬：西方语言(如英语、德语)的语义场划分往往基于逻辑分类，而汉语学者更强调词的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具有汉语特点的语义场分析方法。这种本土化的接受与改造，体现了理论旅行中的创造性转化。

1980 年代以来，Langacker (1987)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成为国际语义学的主流范式之一[18]。汉语学者在引介这些理论时，并非简单的“应用”，而是通过汉语同义词的案例检验、修正甚至挑战某些普遍性假设。例如，汉语中大量存在的“近义复合词”(如“观看”“奔跑”“询问”)是否反映了某种跨语言的词义组合偏好？这类问题将汉语同义词研究带入了与类型学和语言普遍性理论的对话之中。

进入 21 世纪，同义词研究日益成为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的重要技术课题。WordNet、FrameNet 等英语同义词知识库的建设，推动了词语相似度计算、词义消歧等任务的快速发展。汉语学界也在积极构建同义词词林、中文概念词典(CCD)等资源，并参与 SemEval 等国际评测。这些工作需要与国际通用的语义标注规范(如 WordNet 的 synset 概念)进行对接，但同时又面临汉语特有的同义词聚合规律(如单双音节词的分布差异)所带来的技术挑战。因此，当代汉语同义词研究已经不再是书斋中的纯文本考据，而是深度嵌入到国际计算语言学的技术网络之中。

总之，只有将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学术史叙事放置在世界语言学思想演进的更大坐标系中，才能真正理解哪些问题是汉语研究所独有的贡献，哪些问题则是人类语言普遍规律的汉语体现，从而在对话与比较中推动学科的深入发展。

5. 结语

纵观汉语同义词研究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范式演进的内在脉络。在研究目的上，同义词研究经历了从经学附庸到独立学科的转变：传统研究服务于经典解读，现代研究则将同义词作为词汇学的独立课题，当代研究更拓展至语言教学、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应用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经验归纳到科学分析的飞跃——“浑言析言”代表了传统训诂学的最高成就，虽基于深刻洞察却难以形式化，而义素分析法追求精确化与可操作化，使同义词辨析走上了科学化道路。在研究视野上，完成了从零散考释到系统建构的转型：传统研究多关注个别词对，现代研究借助语义场理论关注词汇的系统关联，当代研究则进一步将共时描写与历时演变、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研究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范式的演进并非简单的“进步”或“取代”，传统范式的价值并未因新范式的出现而消失，“浑言析言”所蕴含的辩证思维与整体眼光，至今仍是同义词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素养。梳理学术史的目的不在怀旧，而在于更有力地迈向未来。汉语同义词研究仍面临诸多有待深化的课题：如何进一步整合古今方法，建立既符合汉语特点又具有科学性的分析框架？如何将同义词研究与词汇类型学、语言接触研究以及国际语义学的前沿理论相结合，在比较中凸显汉语的共性与个性？如何利用大数据、词向量和人工智能技术推进同义词资源的建设和应用，同时避免技术崇拜对语义细腻性的遮蔽？这些问题期待着新一代学者的探索与回答。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在对话中拓展视野，在比较中深化认知，在创新中实现发展。

参考文献

- [1] 洪成玉. 汉语同义词的形成和发展[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106-112.
- [2] 李晓春. 《说文解字》释义浅析[J]. 华东冶金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4): 60-62.
- [3] 王瑛. 浅析《说文解字》的同义词[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5): 96-97.
- [4] 周光庆. 段玉裁对古汉语词义关系的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3): 112-118.
- [5] 马景仑. 《说文》段注对同义名词的辨析[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3): 139-144.
- [6] 梅书静.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浑言”、“析言”术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漳州: 漳州师范学院, 2012.
- [7] 钟明立. 《段注》在同义词研究上的继承与发展[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5): 68-74.
- [8] 池昌海. 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2): 59-64.
- [9] 周祖谟. 汉语词汇讲话[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9.
- [10] 吕叔湘. 语法学习[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张永言. 词汇学简论[M]. 武汉: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
- [12] 周光庆. 古汉语词汇学简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13] 任晓静. “看类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共时分布[J]. 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 2017(3): 64-67.
- [14] 苗杰. 信息化时代中义素分析对于汉语近义词辨析的意义探究[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4(3): 114-115.
- [15] 蒋绍愚. 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几个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2(3): 174-181.
- [16] 李华平. 论古汉语隐喻同义词[J].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7, 40(6): 77-82.
- [17] 汪维辉. 汉语词汇史[M]. 上海: 中西书局, 2021.
- [18] Langacker, R.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